■ 政德镜鉴

刘宠和杨维乔，两位烟台籍父母官，虽时代相隔千年，坚守清廉操守却殊途同归。刘宠离任，两袖清风，不肯取民一钱；杨维乔居官，不畏权贵，不惜身陷囹圄，数度为民请命。据传，乾隆皇帝曾为刘宠点赞：“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留一话千秋。而今若问亲民者，定道一钱不敢留。”

刘宠与杨维乔：居官莫道一钱轻

□ 本报记者 鲍青 隋翔宇

300多年前，一位名叫杨维乔的监察御史独自行到了烟台养马岛。

异地为官的他，这次休沐返乡，是慕名而来。但他所慕之名，非岛上的旖旎风光，而是长眠于此的同乡先贤。

杨维乔自出仕以来，素为服膺东汉“一钱太守”刘宠的清廉事迹，仰慕他爱民如子、居官无所取的高尚品性。闻岛上有刘宠墓，他便欣然前往拜谒。

静伫墓前，万籁俱寂，唯有海风在耳畔沙沙回响。杨维乔屏息凝神、心眼合一，努力触碰着刘宠的廉洁正气。良久之后，他突然开口，高声吟诵：“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持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是啊，一钱虽轻，背后却凝聚着百姓的滴滴心血，做官为政者若无此识，将何以为官？

岛外海天一线、巨浪拍石，岛上“得悟”的杨维乔跨越千年，与刘宠心神相接。

好官真心护百姓 百姓盛情送好官

刘宠是烟台牟平人，杨维乔生于烟台莱山。二人家乡近在咫尺，古今相逾千年。

今天的养马岛，刘宠墓早已湮没无闻，故迹难寻。但他和杨维乔的浩然正气，并未随实物消逝而有一丝衰减。他们的官品官德，传为美谈，历久弥新，至今仍砥砺着芸芸后来者。

“一钱太守”刘宠，字祖荣，东汉东莱牟平人。他出身西汉宗室，是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的后代。刘肥之孙刘渫受封为牟平侯，刘宠这支便迁往牟平封地居住。

刘宠幼时，即跟随父亲刘丕学习儒家经典。刘丕为当时硕儒，品德高茂，学识渊博。清初历史学家万斯同著《儒林宗派》，将刘丕和刘宠一同纳入汉儒序列，足见父子二人学识纯熟精深。

通晓经籍的刘宠，才能闻名遐迩，地方以“明经”的名义举荐他为孝廉，旋即出任东平陵县令。东汉时的东平陵县，在今天的济南章丘一带。

刘宠生活的年代，已经出现了天下将乱的端倪。东汉中期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是豪强势力的肆意膨胀。依靠豪强联盟支持取得天下的光武帝刘秀，对豪族的诉求听之任之。经百年土地兼并，东汉中期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地方豪强仗着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欺男霸女、鱼肉乡里，官府士绅们司空见惯，要么袖手旁观，要么沆瀣一气。孤弱的百姓有冤无处喊，有苦无处言。

刘宠素有“修齐治平”的弘愿，渴望改革积弊，重兴汉室。上任以后，刘宠出入田间，劝农耕桑，难得安居。水旱未至，他便定期查看县中各处水源，组织开挖渠道，灌溉面积逐年增加，因而水旱无虞。百姓由此富足，户户都有余粮。

刘宠还严加约束游手好闲、不务农作的府县官员和富家子弟。对于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刘宠一经查实便严惩不贷。在他治下，豪强敛息，百姓吐气，盗贼绝迹。东平陵县人人勤于农耕，社会风气大为好转，以前流亡的百姓也纷纷回乡。县中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每逢佳节必为之祷告，祈求上苍庇佑刘宠。

正当此时，一封母亲患病的书简，快马加鞭送到刘宠案前。侍母至孝的刘宠，虽对百姓有着无限留恋，却也只能辞官而去。

刘县令要走的消息，犹如巨石投水，一传十十传百，在整个东平陵县激起层层波澜。几十个腿脚快的乡亲跑到县衙，拉扯着刘宠的衣袖不忍他离开。曾受刘宠恩惠的百姓更是顿足捶胸，号啕大哭。此情此景，刘宠也是感慨唏嘘，却也无可奈何。

赶来挽留和送行的百姓越来越多，整个县衙被围得严严实实，无处落脚。随后而至的百姓，只好拥到街头、挤进巷尾，最后将整条马路全部堵塞。县吏事先准备的马车无法挪动寸步，刘宠只得换上便装，悄悄从侧门离开。

刘宠走后，还有不少百姓滞留县衙不肯离去。百姓发自肺腑的送行，正说明刘宠在东平陵县行宽政惠政，百姓心悦诚服以心送之。

循吏当年齐国刘 大钱留一话千秋

后来，刘宠相继担任豫章和会稽两地太守，治下均有政绩。会稽在东汉尚处化外之地，百姓朴实拘谨，有的竟然从小到大都没有到过集市城镇。刘宠之前，官吏们认为老实木讷的他们好欺负，便征收繁重的赋税徭役。官吏“竞相虎狼，噬食小民”，百姓不堪其扰，小型动乱屡屡发生。

刘宠上任后，一反常态，凡事“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除掉烦琐的规章制度，禁止部属扰民。郡中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刘宠将会稽治理得井井有条，惠政直达天庭，朝廷征召他为将作大匠，执掌宫室、宗庙、陵寝的土木营建。这是朝廷公认的肥缺，皇帝征用刘宠，正是看重他为官两袖清风的可贵品质。

送别的队伍照例是连绵不绝，刘宠宽慰众人，一一答复，大家这才意兴阑珊地离开。

大队伍走后，五六位须发皆白的山阴县老翁，从山间小道颤颤巍巍走到刘宠面前。老者每人手捧百个大钱，低头作揖，执意奉上。刘宠低身下拜：“各位长者，刘祖荣何德何能，敢劳烦如此盛情？”

老翁哆嗦着摊开双手说：“我们都是山沟里的庄稼人，苟活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见过郡守啥模样。以前几任太守，不治生产，搜刮为要。敛财的官吏白天黑夜从不间断，有时村子里的狗要叫一个通宵，老百姓没有一天安生日子过，被逼无奈，许多人逃亡为盗。可自从您到任以来，秋毫无犯，凡事清净为要，从不扰民害民。如今百姓白天看不到恶吏，夜里听不见狗叫，全赖您的恩德。我们逢此清平盛世，平生无憾。现在听说您要离我们而去，我们心中虽是不舍，却也要特意来奉送，您一定要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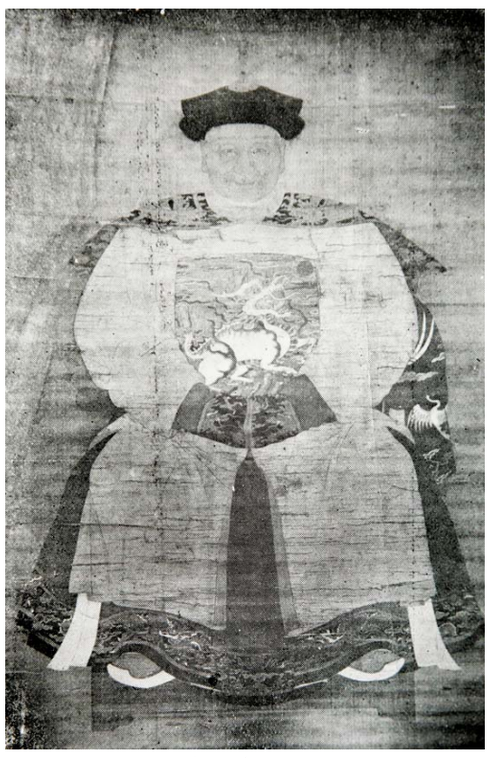
刘宠慌忙俯身，鞠躬行礼，“这都是我为官的分内事，哪像几位长者所说的那样？”刘宠数番推让，老人们却执意相送。眼见盛情难却，刘宠只得在其中挑了一枚大的钱币收下。

老者走后，刘宠随手将大钱抛入江中，让它永远留在了会稽郡。据传，原来此水浑浊，刘宠抛币后竟焕然清澈。后人将此水改名为钱清江，称呼刘宠为“一钱太守”，怀念他的清廉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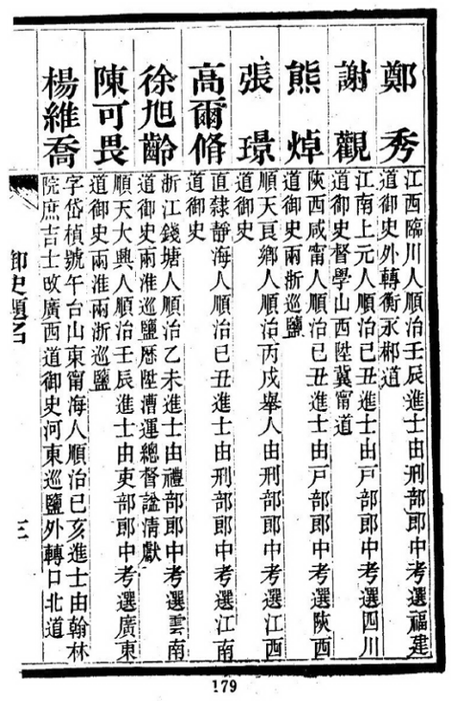
刘宠入朝后，历任要职，为国砥柱。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见宦官乱政，心中幽愤，商定除宦者以清君侧。密谋遭泄，二人无辜惨死。刘宠升任司徒，后任太尉，负责收拾残局，重振朝纲。他忍辱负重，竭力安抚各派，力图复兴汉室雄风。但因发生日食，皇帝以为灾异，便把刘宠当作替罪羊，草草免官。汉室中兴的努力戛然而止。

刘宠免官后，终老于家，再未对政治有实质影响。东汉王朝也在灵帝“亲小人，远贤臣”的昏碌下走向衰亡。

据《魏地形志·牟平》载：“莒岛(即养马岛)有刘宠墓。”



杨维乔画像



鄭秀 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由刑部郎中考選福建道御史外轉衡永郴道
謝觀 江南上元人順治己丑進士由戶部郎中考選四川道御史督學山西陞冀甯道
熊焯 陝西咸甯人順治己丑進士由戶部郎中考選陝西道御史兩浙巡鹽
張璟 順天良鄉人順治丙戌舉人由刑部郎中考選江西道御史
高爾脩 直隸靜海人順治己丑進士由刑部郎中考選江南道御史
徐旭齡 浙江錢塘人順治乙未進士由禮部郎中考選雲南道御史兩淮巡鹽歷陞漕運總督諡清獻
陳可畏 順天大興人順治壬辰進士由吏部郎中考選廣東道御史兩淮兩浙巡鹽
楊維喬 字岱楨號午台山東甯海人順治己亥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廣西道御史河東巡鹽外轉口北道

179

《国朝御史题名录》中记载的杨维乔

刘宠墓。”

今天的绍兴钱清镇，便是近2000年前的刘宠抛币处。这里有一钱亭、一钱太守庙等古迹，古往今来吟咏怀古者络绎不绝。据说，乾隆皇帝巡视江南，曾路经钱清江，感慨于刘宠的清廉，欣然命笔：“循吏当年齐国刘，大钱留一话千秋；而今若问亲民者，定道一钱不敢留。”

辞官建村乱世间 祖辈清廉气铮然

刘宠殁后1400多年的烟台，又出了一位清官。他便是前来祭拜刘宠的监察御史杨维乔。

杨维乔，字岱楨，号午台，今烟台市莱山区午台南堵(旧属宁海州)人。杨维乔久宦他乡，平素以村名自号，正寄托浓浓思乡情。

杨维乔出生于明末清初的一个传统耕读家庭。在祖父杨燦时，杨家由烟台解甲庄冶头村辗转搬迁至此，建村午台南堵。

杨燦生活的年代，大明王朝气数已尽。杨燦青年出仕，素有匡扶社稷之志，任过陕西周至县丞、河南内乡县丞、山西大同府经历司，后升福府审理。他亲见朝廷政治腐败，用人不察，贪渎贿赂之风盛行，“庸才居高位，英俊沉下僚”。心高气傲的他，不愿于俗世共沉沦，便毅然辞官归乡，以教授子孙耕读为乐。他教授子弟，每每以居官清廉、扶危济困为要。

据杨燦后人杨明政介绍，杨燦为官清正廉洁，铁面无私。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涯，他不贪不占，仅靠俸禄来维持生计。“平时仅蔬食，菜羹，面无忧色。”

弃官回乡后，时人猜测他的清廉也许是徒有虚表，沽名钓誉，肯定隐匿了丰厚家资而不外露。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即使他的亲人，也在流言蜚语浸染下乱了方寸。杨燦闻听到这些传言，看着众人眼神有异，举止奇怪，便知晓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表清白，他激愤地在神牌前立下毒誓：“若有积金在手，或一两或千两，或偏长子，或偏幼子，伏乞尊神将，将燦生前或遭众分尸千断，死后还遭万劫地狱，更将所给银钱之人，一并照前报应。”

杨燦的誓言泣鬼神感天地，众人赧然。他清廉为官的风范，成为一则传说，为后辈树立了做人行事的标杆。

杨燦重视家教，杨氏子嗣多半成才。据杨氏族谱显示，杨燦的十二个孩子中，三个是生员；二十五个孙子中，一个翰林、一个县令、一个监生、十个生员；曾孙六十三人中，五个举人、两个贡生、十个监生、九个生员；玄孙一百多人中，两个考中进士，三人得中举人，两个贡生、七个监生、二十二个生员。

居官莫道一钱轻 尽是苍生血作成

二十五个孙子中，有一个便是杨维乔。他自幼聪颖，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考录进士，择优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广西、浙江两道监察御史，分巡河东盐政，由监察御史转口北道(今河北张家口及周边一带)参议，旋升道台，司度支，后兼山西布政使衔。

杨维乔未出仕时，便立志激浊扬清、荡涤贪腐。任职期间，他抚恤幼孤，爱民如子，深得民心。一次休沐归乡，闻听养马岛上有刘宠墓，便乘兴而往。在刘宠墓前，杨维乔慷慨赋诗，作《题莒岛汉刘宠墓》，诗云：“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持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杨维乔这样说，也这么做。为百姓申冤，杨维乔以身犯险，在所不辞。任职口北道期间，有一年，风涝虫三灾并起，地方灾情连绵不断，又赶上了闹春荒，百姓饥寒交迫。无粮可食的农民，只好以树叶、树皮和观音土度日。杨维乔亲自到灾区察看，望着百姓流离失所、孤苦无依的惨象，他心中煎熬似火烧。

回到府衙，杨维乔立刻拟就折片，上奏朝廷，汇报口北道灾情。康熙帝接奏折后，当即下诏拨粮救灾，拯黎庶于水火。每逢灾荒，虽是平常人家饥寒交迫的苦日子，却也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大好时机。当时有一位冷姓同僚，私下与杨维乔商议，打算在粮食里面掺沙石，克扣倒卖赈灾粮食，从中渔利。杨维乔认为为民父母官，平时要体恤百姓，危急时刻更要奋力救民，绝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欺君害民的龌龊事。他坚决拒绝了同僚的要求，并决定上奏朝廷，揭发此事。

哪知冷姓同僚碰壁后，怀恨在心，他联合几个同伙，恶人先告状。他们诬陷杨维乔借放粮之机，在粮中掺沙，坑害百姓，趁机发财，弄得民众怨声载道。康熙帝误信谗言，以假为真，龙颜大怒，一道圣旨，判处杨维乔死刑，立即执行。

杨明政说，关于杨维乔的获救，村里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杨维乔处斩那天，天空彤云密布，狂风不止，飞沙走石，似乎上苍都为他鸣不平。杨维乔乘坐囚车，披头散发，被押往法场。赶赴京师的口北道百姓一溜两行，个个头顶一箍香，长跪于法场，哭声震天。一时间众烟袅袅，随风飘往紫禁城的上空。康熙帝见此，惊问其故，左右大臣含糊答复。康熙帝派人查明原委，才得知个中真情。他立即传旨赦免杨维乔，派人火速缉拿冷姓奸臣，并当场问斩。

鬼门关前逃出生天，并没有消磨杨维乔的浩然正气。官复原职后，杨维乔继续革除积弊，抑制豪强。恰有京中的权贵，遣其家人，趁着山西大同一带闹饥荒的机会大贩人口。当人贩子回到张家口时，杨维乔将所贩人口全部扣留，交由地方设法抚养。秋收以后，又将他们送回原籍，人贩子受到重惩。

杨维乔的这一举动，虽极得民心，却又开罪了权贵。权贵联合他人诬陷杨维乔贪赃枉法。杨维乔再次被逮捕入狱，屈打成招，在狱中整整度过了17年。

刑满释放的杨维乔，被折磨得已是皓首苍髯。经过众同僚的力谏，杨维乔的冤案得到平反。康熙皇帝召见了蒙受冤屈的杨维乔，对他的清廉刚正大加褒奖，有意加官晋爵委以重任。奈何杨维乔两次蒙冤入狱，已看透世态炎凉，对仕途心灰意冷。他跪谢隆恩，恳切地说：“臣现已年迈，力不从心，不能再任高职了，恳求陛下让我告老回乡。”康熙只好应允，令地方官员一路迎送，提供便利。但杨维乔清廉自律，坚辞圣意，只骑一驹，私下启程，一路寻访民情，知民疾苦。杨维乔丝毫不惊动官府，地方官员皆迎一空。

杨维乔回乡以后，召集族中子弟，教之读书习文。杨氏家族因而得功名者众多，南堵也被称为“宁海州科举第一村”。

耄耋之年，他悠闲自得，缄口不谈朝政之事。平时他热心为乡里百姓排忧解难，博得乡民交口称赞。

今冶头村西有一座石桥，相传他的书房就在桥畔。他曾作《石桥诗》云：“结庐傍石桥，溪畔柳千条。岸上新琴谱，瓮头旧酒瓢。久贫人事少，多病壮心销。老大便宜处，十年不早朝。”全诗用词清丽，悠然自得中透着一股羲皇上人式的洒脱。

他的诗集有《闲闲吟》《屯具斋诗稿》，现今都已经遗失。

在他第二次被逮捕时，宣化府(今河北张家口)人感念他的恩惠，为他建立了生祠，定时祭拜。他出狱后，曾致信当地，请求将生祠改为乡贤祠。杨维乔卒后，又崇祀于宁海州乡贤祠中。

杨维乔逝世后，被葬于冶头村的店后一带，墓前立碑，却是极为普通的石碑。

然而，他的故居、墓地、祠堂，今已不复存在。

杨明政说，到了“文革”时候，乡村兴起平坟，杨维乔的坟墓也未能幸免。村人把坟扒开，发现里面有一块青石碑，四五十厘米见方，内有篆字，乡人不识，冶头人遂将灵柩深埋。

杨维乔为官时，曾为爷爷修有牌坊一座。这块牌坊，也在1966年10月被拆。当时正在搞“破四旧”，村里有几个跟风的人向村支书提议把牌坊拆掉。村支书畏于形势，不得不从。于是几个年轻人带头拆掉了牌坊。后来这几位带头拆牌坊的年轻人全都患怪病死去，年纪也都不大。村人论及此事，至今犹感敬畏。

今日的南堵村，已成为一处拥有一千三四百户人家的城郊社区。记者在村委会大院里，随机询问了几位老人，他们对杨维乔的事迹基本已没有了记忆，甚至连杨维乔是谁也不知晓。

生时为民，死后民忘，刘宠和杨维乔大概也希望这样。

·相关阅读·

古代官员离任衍生出“离任文化”。清官卸任，百姓难舍，产生“遗爱靴”“万民伞”“德政碑”等千古佳话。久之，贪官也竞相效仿，以“不交接”相要挟，强迫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脚，百姓脱掉官靴，用“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

□ 本报记者 鲍青

在古代官场，大小官员们犹如棋盘上的一颗颗棋子，如果一直不动位置，总是不大合适的。政声佳的要提拔，官声差的要处罚，总之都要靠动一动来彰显朝廷的意志、选才的取舍。

所以官员们的离任交接，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衍生出涵括广袤的“离任文化”。翻开浩瀚典籍，数千年里的各色官员离任，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清官离任，百姓依依不舍、哭声震天；贪官走人，百姓欢呼雀跃、诅咒谩骂。孰清孰贪，恋谁厌谁，一目了然。

例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刘宠离任东平陵县，“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刘宠后任会稽太守，离任时几位头发斑白的古稀老人从山中走出来，手捧百钱执意赠送。刘宠盛情难却之下取其一枚，后抛至水中，留下“一钱太守”的美名。

百姓对循吏的不舍和留恋，从送别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刘宠离任，老人赠金，尚属有意为之。那有时清官离任，无意之间也会留下名垂青史的典故佳话。据《新唐书·崔戎传》，崔戎任华州刺史时，与民休息，秋毫无犯，百姓因而乐足，咸称戎德。这在藩镇割据、动乱频仍的中晚唐，显得尤为难得。崔戎爱护百姓，百姓也真诚拥戴崔戎，把他当作民之父母，顶礼膜拜。

后来朝廷调崔戎任兖海沂密都团练、观察使职。华州百姓闻听崔大人要走，成群结队跑到府衙，竞相痛哭，苦苦挽留。为了不让崔戎离开，有的百姓顺手就把他的靴子脱掉，有的则把他的马鞍扯下，大家挡着道舍不得让他离去。

有些经过兵燹之灾的年长百姓，甚至对前来宣布诏令的使臣下跪请愿，要求代为转达百姓心愿，恳请将崔大人留在华州。使者见此感人情景，满口答应。但崔戎却极力阻止，认为为官者应以朝廷诏命为重，不能轻言抗命。没想到这几个百姓竟大无畏地说：“留公而天子怒，不过斩我二三老人，则公不去矣。” 百姓不惜身死而留崔戎，可见对崔戎恩德感怀之深。崔戎无奈，只得星夜骑快马出城，百姓发觉后追赶不上方才罢休。

崔戎人虽走了，但被扯掉的官靴却留了下来，成为百姓的念想。他们将“神物”供奉起来，建堂立庙，定期祭拜，以表怀念。后世称此靴为“遗爱靴”，把它作为勤政爱民的一种象征。

随着沽名钓誉的官员越来越多，“脱靴”慢慢变成了例行程序，“遗爱靴”也越来越泛滥。

如果是清官廉吏要走，百姓自然要拦轿脱靴。但一些贪官，也竟相效仿起来，以“不交接”相要挟，强迫几个百姓配合表演。官员主动伸出双脚，百姓脱掉官靴，拿到靴子的民众再用个装裱华丽的“匣子”装好，钉在城门上供奉，让进出的市民观瞻。

“脱靴”从无心之举变成有意为之，原有的韵味褪去，变得真假难辨了。

但百姓发自肺腑的告别，总能在俗套的“脱靴”上焕发不一样的风采，演绎一抹与众不同的感动。

如清康熙年间，松江人民送别某知县离任。因其政德卓著，爱民如子，百姓簇拥脱靴，把酒恸哭，不忍离别，县官亦为之大哭。蜂拥而上的百姓，先后脱去知县的四十余只官靴。待知县走后，松江人如丧考妣。可见为官者若真的为百姓谋福，老百姓还是很记情的。

再如清乾隆年间的张京，丁酉年(公元1777年)中举后任诸城县令。史载，他“甫莅任，遇蝗灾，旱甚，京设局收蝗”。后来诸城遭遇干旱，张京闻听城南有龙潭山，在山上祷告求雨每每灵验。为了百姓苍生，张京步行前往百余里外的龙潭山。也许是诚心感天动地，张京还未返城，瓢泼大雨便降临诸城。第二年春天，临近的州县受旱绝产，唯有诸城大丰收。

张京在诸城力行宽简之政，以教化为重。琅琊书院坍塌许久，他倡导乡民募捐重新修葺，还延请名师前来讲学，诸城的科举考试成绩蒸蒸日上。

张京“为政尚宽，讼狱不留，刑不滥用，竹笞不过二十”。但他的宽仁并非泛爱，“不宥奸宄，故盗贼敛迹”。前任县令刘建为官严厉，张京为政慈爱，百姓称他们二人为“刘父张母”。

后张京为解救无辜者忤逆了上司，被撤去官职。

张京一心护百姓，百姓世世念张京。他离任时，“饯送数十里不绝，并有送至省垣者”。诸城百姓在苏轼喜雨亭旁立了一座生祠纪念他。张京离任的“脱靴”处，也被百姓安置在了东门外。自五莲山及收蝗虫的地方，皆有生祠。琅琊书院前有五公祠，祀苏公轼、杨公继盛、刘公建及张公京、周公某。咸丰五年，司寇王琦庆，为张京请祀名宦祠。

此情此景，至今忆来犹让人动容。

对清官，百姓念念不忘；对贪官，他们则以独有的智慧予以辛辣讽刺。

明嘉靖年间，昆山县令杨廷桢千里为官只为钱。他把昆山一地搅得鸡犬不宁，百姓难有一日安宁。听到杨廷桢即将离任，当地绅民送匾一块，上书“天高三尺”。杨廷桢百思不得其解，还以为是乡绅对自己政绩的颂扬，便满心欢喜接受下来。后来还是一位同僚点破其中玄机，“杨大人，天高了三尺，是因为地低的缘故啊。百姓这是在说你把昆山地皮刮低了三尺。”杨廷桢闻之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

又如署名“乐天大笑生”的明朝谐谑书《解愠编》中载：“一仕官贪墨甚，及去任，仓库为之一空。可他还不满足，寻来一把折扇，将当地山水画于其上。其民作德政谣讽刺：‘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此等充满了劳动人民智慧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相较于“一钱之赠”“遗爱靴”等特色送行，当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官员立碑，记载他们的政德官声。

清官离任时，乡绅们向百姓摊派若干的钱粮，请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显要的地方。例如西晋大臣羊祜离世后，襄阳百姓便在他生前爱游览的岘山立起德政碑。

可后来形势变化超出了百姓预料。即使是“刮地三尺”的贪官，离任时也要看到德政碑树起才肯罢休，否则便借故拖延不走。到了唐朝，为了杜绝此类陋习，政府下令不许再立德政碑，私自立的碑不仅要拆毁，相关责任人还要受一百大板的刑罚。

规定在严格杜绝的同时，也开了一个可商量的小口子。如果该官员爱民如子，老百姓坚决要求立碑，可以逐级上报，由礼部允准。可多层审批、拖延，往往旷日持久，无法配合官员离任时的气氛，德政碑再也无法兴盛。

德政碑衰落了，“万民伞”便代之而起。相较德政碑，万民伞成本更低、意味更浓。百姓送“万民伞”，象征着官员一地为官，如巨伞一样佑护着老百姓，为草民遮风挡雨。官员收到的万民伞越多，便表示百姓越是感激。“万民伞”既能表达对清官的敬意，又可以速成，无需经过繁琐的审批手续，于是很快流行开来。

但凡事总是物极必反，清官离任百姓自发送伞。可贪官离任，如果无人送伞，岂不是大大伤了脸面？所以他们也会想法设法弄点万民伞装点门面。

其实古往今来的著名廉吏，往往离任时“一身轻松”，不拘于那些可有可无的装点之物，他们的清廉和爱民，就萌发并植根于百姓的心间。

如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江苏涟水县)。临行前，米芾特将笔墨置于水池洗清，以示“来去清白”。他除了随身携带几件衣物和文房四宝外，未带走涟水一草一木。但他走后，当地人将他洗笔墨的水池整修一新，命名为“廉池”，至今仍引来无数游客景仰。有人触景生情赋诗一首，表达对米芾“轻松离任”的景仰：“米公洗墨净心灵，清气盈身任远行。多少华园无觅处，廉池日日溢丹青。”

明代大清官海瑞，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百姓誉为“海青天”。海瑞离任淳安县县令时，家家户户在门前供桌上摆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颂扬他“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没有了笨重的“德政碑”、作秀的“遗爱靴”和虚华的“万民伞”，一碗清水一面明镜更让人动容。

官员离任是一道考题、一面明镜，而群众送行的反应，就如同“晴雨表”，度量着为官者的政绩名声，折射着他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抛离天花乱坠的送别程序后，浮现出来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方为官德真谛。